

山西大学科学技术哲学文库

著

孙慕天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只所西方人的一家之言是不全面的，苏联哲学逻辑与马克思主义思想异向，是科学哲学的另一个参考系，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BaShe De
LiXing

巴舍德 涉及的 理性



科学出版社
www.sciencep.com

山西大学科学技术哲学文库

著

孙慕天

国家八五社科基金项目

BaShe De
LiXing

巴舍德 的理性

科学出版社

北京

内 容 简 介

本书是一部从内史和外史相结合的角度全面总结苏联自然科学哲学的学术著作。作者对横跨 108 年的苏联(俄罗斯)自然科学哲学的历史发展,做了全景式的展示,研究了自然科学哲学领域的思潮演进和重大事件,重新评价了一系列重大的学术公案,总结了处理自然科学、哲学和政治关系方面的教训,反思了学者走入误区的历史原因。作者着重分析了苏联自然科学哲学领域主流和非主流学派的斗争,探讨了具有改革倾向的科学哲学家的原创性观点,凸现了“异端派”在科学哲学思想上的突破。本书注重苏联与西方科学哲学的比较研究,探索了马克思主义导向在自然科学哲学研究领域的优势,进而对自然科学哲学的特殊学科地位做了全新的反思。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跋涉的理性 / 孙慕天著. —北京:科学出版社, 2006

(山西大学科学技术哲学文库)

ISBN 7-03-016928-X

I. 跋… II. 孙… III. ①自然哲学 - 哲学史 - 俄罗斯 - 1883 ~ 1917

②自然哲学 - 哲学史 - 苏联 - 1917 ~ 1991 IV. N095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12490 号

丛书策划:孔国平 / 责任编辑:孔国平 李俊峰

责任校对:陈丽珠 / 责任印制:钱玉芬 / 封面设计:张 放

科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东黄城根北街 16 号

邮政编码: 100717

<http://www.sciencep.com>

双 青 印 刷 厂 印 刷

科学出版社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06 年 8 月第 一 版 开本: B5(720 × 1000)

2006 年 8 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 17 1/2

印数: 1—2 500 字数: 336 000

定价: 35.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我社负责调换〈双青〉)

《山西大学科学技术哲学文库》编委会

主编 郭贵春

编委 (以姓氏笔画为序)

孔富安	成素梅	乔瑞金	杨小明
李红	张汉静	张培富	郭剑波
郭贵春	高策	殷杰	魏屹东

自序

我们这一代人是和新中国一起成长起来的，而我们的童年和青少年时代，和苏联这个社会主义国家有一种复杂的感情联系。先是爱，在我们年轻的心里，那是一块梦的土地，就像苏联作家巴巴耶夫斯基那部小说的名字——《光明普照大地》；接着是爱转恨，我们都读过日本左派写的《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吗？》，在珍宝岛的枪声中感受“苏修”这个“北极熊”强横的身影；后来恨又转为惊，这个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竟红星陨落，一朝瓦解。在我们心中，每当想起这个国家，不禁百感交集。

1988年11月7日，就在十月革命节71周年这一天，我出国访学来到莫斯科。那天晚上我站在红场上，看着克里姆林宫的城墙，想起小时候唱的歌：“柔和晨光，在照耀着，克里姆林宫古城墙”，心中真有无言遐思。刚刚踏上这片土地，就有两件事情让我感慨不已。那时中苏关系尚未正常化，苏联的一切都像隔着一层雾，透着一种神秘。我往国内发信报平安，到报亭买邮票。我问看报亭的老太太往国外寄信邮资是多少。她问我往哪个国家寄，我反问她：“这有什么区别吗？”她回答说：“往资本主义国家寄是50戈比，往社会主义国家寄只要5戈比。”我又问：“往中国寄信，要贴多少钱的邮票呢？”她毫不迟疑地回答说：“那是社会主义国家，贴5戈比的就行了。”啊哈，两大阵营壁垒分明，我们这是来到社会主义的“老家”了。当时住在大学生宾馆，吃饭时，我们几个看见饭厅就进，发现里面简直就是联合国，各个国家的人都有。吃的是自助餐，也没有人收费。我们十分诧异，难道这里像我们“大跃进”时一样，吃饭不要钱吗？一天后见到使馆的同志一问，才知道搞错了，原来那里是专门给亚非拉第三世界穷国的学生开设的免费食堂。好啊，人家是社会主义的故乡，我们这是在“世界革命的中心”。街上到处贴着“一切政权归苏维埃”、“庆祝苏共第十九次大会胜利召开”的红色大标语；一对对新人在列宁纪念碑前或烈士墓前献花；进到大学的课堂，一位哲学教师正讲授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提出的哲学党性原则；还有低廉的、超稳定的物价，无人售票的公交车辆。看起来一切都很正常，社会主义的列车似乎正在沿着十月革命开辟的道路奔驰……

可是，过了一些日子后，却觉得有点不对了。“愤怒的诗人”叶甫图申科在捷尔任斯基广场上演讲，“愤怒”全发泄到共产党和社会主义身上，而广场上成千上万的苏维埃人却欢声雷动；电视里每天晚上都在播当年一桩桩冤假错案，基洛夫、奥尔忠尼启则、图哈切夫斯基等，不是厘清历史，而是直指社会主义制度；我亲耳听

乌克兰人对我说“俄罗斯人正在奴役我们”，乌克兰必须争取解放。生活并不如意：食品和日用品匮乏，又小又酸的苹果一摆出来，人们立即排成长队；中国的羽绒服、雪地鞋都成了抢手货，而商店仓库里积压的鞋子却多达上千万双；官方美元对卢布的汇率是4:1，黑市上却倒过来，是1:9。

这真是巨大的时空倒错。我想起作家王蒙在《访苏心潮》里说的话：“到苏联访问是灵魂的冒险。”对我这一代人来说，这是信仰的拷问，灵魂的拷问。我们不能不反思，这就是我们曾经魂牵梦绕的苏联吗？就是那个歌里所唱的“我们没有见过别的国家，可以这样自由呼吸”的光明之域吗？在那里度过的几百个日日夜夜里，我一直在想，苏联的过去和现在本身就是历史之谜，人类要想走向未来，非解开这个谜不可。那时，戈尔巴乔夫的改革闹得正欢。新年晚上，他在电视台发表新年祝词，我们几个留学人员坐在一起，都有种说不出的滋味，觉得这个国家要出事。

1957年，17岁的我考入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入学时反右运动刚过，学校要搞教改，为制定新教学方案，系里拿来莫斯科大学哲学系的方案供我们讨论。那是六年制的计划，光数理课程就有七八门，我至今还记得有一门课是“感光器官生理学”，想来是为了使学生具备必要的实证科学基础，以便深刻理解反映论吧，实在令人叹为观止。我们系当然没有那么庞大的课程规模，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当时我们所学的专业课程的观点，基本未出苏联主流哲学的窠臼。老实说，苏联米丁之流搞的那一套死条条，根本不能在我这个敏感少年的心中激起哪怕一点点热情，当时我最提不起兴头的就是所谓“原理”课。也许正因如此，在我们心中，苏联哲学差不多就是繁琐僵化的代名词。我一直有个疑问：苏联那么多极有学问的大哲学家，难道就没有一点独创性的思考吗？

来到苏联后，我才知道，原来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有一批所谓“六十年代人”，是苏联哲学中的“反叛”，而且他们恰恰是从科学哲学切入，用哲学语言为改革鸣锣开道。特别是凯德洛夫、科普宁和伊里因科夫这“三驾马车”，所提出的科学认识论观点颇多未发之覆，与西方科学哲学有异曲同工之妙。有意思的是，这批人并不跟着西方跑，而是重新解读马克思主义的经典文本，开辟了马克思主义科学哲学的传统，令人耳目一新。1988年12月5日，我在哈尔科夫大学买到什维列夫的《科学认识分析》，此书刚刚出版，我兴趣盎然地读了全书，完全扭转了以前对苏联哲学以偏概全的片面看法。一个民族的智者为了探求真理走过了漫长的道路，充满了艰难曲折，这是理性的长征，理性在跋涉，这令我肃然起敬。

苏联哲学改革派的一个根本特点就是哲学本身重新认识。哲学是爱智慧，这个老生常谈其实本身就饱含智慧。知识不等于智慧，愚蠢也并非一概源于无知。苏联哲学的“六十年代人”冲破了用“自然、社会和思维的最普遍的规律”定义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戒律，把哲学看作是启迪智慧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这是一场意义深远

的思想解放运动。

很幸运,我在乌克兰邂逅了伊万·扎哈罗维奇·采赫米斯特罗教授,和他就EPR悖论与量子相关性问题深入交换了意见,并合著了《新整体论》一书,使我尝到了跨文化交往的乐趣。他使我这个异国游子获得了家园之感,也使我亲身感受到真理性的知识是无国界的。每当他以极强烈的好奇心就老子哲学向我发问时,听到会心处,他那双蓝色的大眼睛发着光,常使我有一种异样的感动。哲学文化是属于全人类的。我常常想:哲学是否也应当和实证科学一样保护发现的优先权?无论如何,我们总不能把亚里士多德“个别就是一般”的命题说成是自己首先提出的吧?在读苏联科学哲学那些充满睿智的文本时,我总有一种感叹——我们有时当作新发现来讨论的一些主题,人家早就研究过了,那些文献白纸黑字,赫然摆在那里,而我们却视而不见充耳不闻,大搞重复劳动,一再从头做起,这岂非大悖于学术规范?总之,从那时起我就想系统介绍苏联自然科学哲学的研究成果,至少要让国人知道,在我们的一个伟大邻国那里,有一笔丰厚的思想资源是值得开掘的。科学无国界。我曾片段地读过钱钟书先生的《管锥篇》,惭愧得很,由于学力不逮,并未真的读懂。但钱先生那种“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的学术眼光,却使我大为叹服。我常想,如果能有钱先生的学术水平,开展东西方科学哲学的比较研究,一定会大有收获。我在自己的这项研究中,也稍微做了一点这方面的尝试,东施效颦,只能说是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苏联解体打乱了我原来的计划。形势大变,很多问题必须重新反思,而且大量档案的解密,使得对一些历史事件也应当另做评价,这项开始于15年前的工作于是耽搁下来。近几年尘埃落定,我觉得对一些重大问题已经可以做出结论了,在朋友们的催促下,终于鼓足勇气,把这份稿子提交读者批评。面对此稿,转首四顾,不免也有些微伤感,学术界的浮躁对纯粹科学的追求已经造成了太大的干扰。当时代艰苦时,文以载道,文化人立德立功立言,甚至不惜以身相殉。方今盛世,市场勃兴,食利主义原则进入学术而使斯文扫地。19世纪末,恩格斯有感于德国工业化后哲学的衰落,曾说:“但是随着思辨离开哲学家的书房而在证券交易所里筑起自己的殿堂,有教养的德国也就失去了在德国的最深沉的政治屈辱时代曾经是德国的光荣的伟大理论兴趣,失去了那种不管所得成果在实践上是否能实现,不管它是否违警都同样地热衷于纯粹科学研究的兴趣。”真是慨乎言之。

文学家孙犁说:“彩云散了,记忆中仍是彩云;莺歌远了,记忆中仍是莺歌。”生活的这一阶段已经永远逝去,但它却是美好的,我为此而深感欣慰。

目 录

自序	
导论	(1)
第一章 开辟时期(1883~1924年)	(11)
第一节 自然科学哲学在苏维埃俄国产生的历史前提	(11)
第二节 普列汉诺夫的自然科学哲学思想	(17)
第三节 列宁对自然辩证法的伟大贡献	(25)
第二章 摸索时期(1924~1953年)	(42)
第一节 斯大林模式和科技进步的指导思想	(42)
第二节 “大转变”时期的两次大批判	(52)
第三节 李森科事件和自然辩证法的蒙羞	(64)
第四节 反世界主义和伪科学的泛滥	(78)
第三章 调整时期(1953~1985年)	(111)
第一节 两次不成功的改革尝试和新旧思想的更迭	(111)
第二节 调整科学和哲学的关系	(127)
第三节 科学哲学在苏联的兴起	(160)
第四章 转型时期(1985~1991年)	(181)
第一节 改革的歧路和理论的迷思	(181)
第二节 人道主义和自然科学哲学的人文化转向	(195)
第三节 马克思主义自然科学哲学的历史命运	(213)
结论 苏联自然科学哲学的历史地位	(238)
参考文献	(261)
后记	(266)

导 论

苏联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存在了 70 多年,这是一段伟大而又充满悲剧色彩的历史进程。苏联的兴起和它的解体是 20 世纪具有重大影响的社会历史事件,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对它的反思日见深入,历史的真实本质也开始显露出来。

苏联的历史道路有一个突出的特点,这就是它的整个社会生活始终带有深刻的意识形态烙印,特别是它的党和国家的各项活动,从来都是和自觉的意识形态设计及意识形态斗争密切联系着的。而苏联自然科学哲学是整个苏联意识形态体系的一个独特的组成部分,所谓独特,主要是因为它从一个侧面集中反映了苏联社会的精神特质,传达了苏联在促进科学发展和维护意识形态“纯洁性”的双重努力之间的矛盾、冲突和曲折演化的种种消息。这一领域浩瀚的文献积淀了几代苏联学者不可计量的心血,其中不乏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创见和辉煌的理论建树。而曾几何时,这一切都成了历史的陈迹。

难道这一切就这样无声无息地消失了吗?难道可以无视这一笔巨大的历史遗产吗?我们不能无视历史,不能以虚无主义的态度把这一页精神史轻率地翻过去。萨顿(J. Sarton)说过一段意味深长的话:“科学史的研究应当是对人类历史的认真解释及其最崇高的命运的展望。人类是在一个毫无希望的圆圈上,像在地狱的圆圈上团团转吗?在我们的生活中除了欺诈、虚荣和伪善之外难道就什么都没有了吗?……人们是否能够分辨出在遥远的地方那条有着真实的光明而不使人误入歧途的道路呢?”^①我们是在国际形势发生重大变化,世界文明和中国社会急剧转型的背景下,着手总结苏联自然科学哲学的丰厚遗产的。现在,我们对社会主义历史命运的看法已经和正在发生变化,在跨入新世纪的门槛的时候,回顾苏联社会舞台上曾经演出过的这一出思想活剧,正是为了探求人类思想,特别是哲学思想演化的规律,拨开迷雾,认清本质,启迪智慧,昭示未来。

一、苏联国内的研究

应当说,苏联学术界自身对这一领域的反思性研究并没有做出多少值得称道的工作,这是很遗憾的。一般说来,苏联意识形态部门和学者们对本国自然科学哲学研究成果的评述和总结仅限于两类:

① 乔治·萨顿:《科学史和新人文主义》,华夏出版社 1989 年,第 7~8 页。

1. 官方的权威性文件

在苏联自然科学哲学发展的各个历史阶段上,苏联的党和政府总要以决议、领导人讲话、社论等形式,回顾历史,分析问题,提出方针,指明方向,这是苏联的传统。早期的评述和总结多以党的决议的形式出现,如红色教授学院和自然科学党支部的著名决议《关于讨论的总结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当前的任务》(1930年)和共产主义科学院主席团《关于自然科学的决议》(1930年)。20世纪50~60年代后,苏联举行了一系列清算历史的专题会议,做出了许多决议,主要有:《相对论讨论的总结》(1955年)、《关于自然科学哲学问题的研究任务》(1958年)、《控制论哲学问题理论会议决议》(1962年)等。官方的意见常常通过社论传达出来,最著名的是《哲学问题》杂志的两篇社论:《加强哲学和自然科学的联盟》(1959年)和《再论哲学家和自然科学家的联盟》(1962年),该杂志直到解体前还发表过一篇颇有影响的社论,题为《改革问题和现阶段苏联哲学的任务》(1987年)。此外,苏联领导人还不断通过讲话直接宣布官方对一些重大问题的指导性意见。从1958年召开的第一届苏联自然科学哲学会议开始,历次会议都在会议的开幕词和闭幕词中对自然科学哲学的发展提出正式的方针和规划。

这些官方文献总的特点是以贯彻中央当前的政治意图为目标,有鲜明的政治倾向性,时间性强,学术价值不高。

2. 学者的综合评述

由于苏联自然科学哲学研究与意识形态一直关系密切,所以长期以来始终属于政治敏感领域,学者一般不便于进行全局性的总结和评价,所以这方面的文献不多。

一般说来,前期多系集体性著作,后期开始出现学者个人的论述。其中权威性的如费多谢耶夫(П. В. Федосеев)等主编的《现代自然科学和哲学问题》(1959年)。还有一批涉及数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天文学、地学等领域的专门著作,如《现代物理学哲学问题》(1959年)、《自然科学哲学问题:地学科学》(1960年)、《现代生物学哲学问题》(1982年)、《高级神经生理学和心理学哲学问题》(1963年)、《天文学哲学问题》(1976年)等,这些文献多数是论文集,属于代表性文献汇编,评论不多。

20世纪80年代以后,出现了学者个人的研究专著,系统回顾苏联自然科学哲学发展的一个时期的历史(主要限于60年代和70年代),对历史的经验和问题做了一些分析,有一定的深度和独立见解。其中80年代初期有代表性的著作是乌耳苏尔(А. Д. Урсул)编写的《哲学和自然科学的联盟:历史的几点总结和发展趋势》(1980年)、弗罗洛夫(И. Т. Фролов)等主编的《哲学和自然科学:当代研究总结和

前景(1970~1980)》(1981年)。80年代后期,苏联出版了两篇值得注意的著作:一是叶夫格拉弗夫(Ф. Е. Евграфов)主编的《苏联哲学史》(1988年),一是斯焦宾为(В. С. Стёпин)美国学者格雷厄姆(Loren R. Graham)关于苏联自然科学哲学专著俄文版所写的跋言——《苏联科学哲学历史发展的分析》(1991年)。前一篇是系统的综述,后一篇则对科学哲学在苏联的历史演变做了深刻理论反思,这在苏联几乎是绝无仅有的。但是,总的说来,其结论仍然注意到官方的立场。1997年俄罗斯推出了马姆丘尔(Е. А. Мамчур)等主编的《国内科学哲学:初步总结》一书,突破了传统的视角,立足于世界科学哲学的历史发展,同时并没有完全抛弃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很有学术价值。但作者没有涉及自然哲学,没有对整个70年间苏联自然科学哲学与社会的关系及其曲折演变轨迹进行梳理,带有明显的描述性质。

值得一提的是,在苏联自然科学哲学的研究方面,苏联学者编纂了两部实用的工具书,一是《自然科学哲学问题:苏联学者著作概览》(1976年),二是《现代自然科学哲学文献索引(1939~1971)》(1981年),为研究者带来了许多方便。

二、西方的研究

西方对苏联自然科学哲学的研究,开始于20世纪30年代。西方学术界对苏联自然科学哲学最初的兴趣是由一个著名的学术报告引发的:1931年在伦敦召开的第二届国际科学哲学和科学史大会上,苏联学者格森(Б. Гессен)^①做了题为《牛顿〈原理〉的社会经济和政治根源》的学术报告,引起了巨大反响。报告运用唯物史观令人信服地分析了牛顿力学的成就、局限与17世纪的时代背景之间的内在联系,使西方学者耳目为之一新,激起了西方学者对苏联自然科学哲学的强烈关注。一部有代表性的回应著作是霍尔丹(J. B. S. Haldane)的《马克思主义与科学》(1939年)。后来,一批研究苏联问题的专家从意识形态与苏联科学的关系这一角度,触及到了苏联自然科学哲学问题。早在1948年,维特(Gustav Wetter)的著作《辩证唯物主义》在意大利出版,1958年又出了英文版,对此后西方苏联哲学的主要研究者如波亨斯基(J. M. Bochenski)、约尔丹(Z. A. Jordan)等人产生了重大影响。他们建立了东欧研究所,创办了《苏联思想研究》杂志,使维特的观点长期左右着西方的苏联学(Sovietology)研究,其中,受到最普遍关注的是关于李森科事件的一些论著,最早的一部是泽克尔(C. Zirkle)主编的《一门学科在俄国的消亡》(1949年)。后来开始出现了专门评述苏联科学和意识形态关系的著作,代表性作品是乔治(F. George)主编的《苏联社会的科学和意识形态》(1967年)。同时,一些专业哲学家也开始关注苏联的自然科学哲学问题研究,但在20世纪30~50年

^① 英语文献中通译 M. Hesse, 国内文献据此译为赫森,现据俄语原文译为格森。

代,主要是从辩证唯物主义的角度涉及某些自然科学哲学问题,如波亨斯基的《苏俄辩证唯物主义》(1950年),胡克(S. Hook)的《马克思与马克思主义者》(1955年)等,虽都涉及自然科学哲学问题,但却都不是专题性的。直到60年代,苏联科学技术的成就震动了西方世界,对苏联发展科学技术的战略和指导思想的研究一下子成了热点,相应地西方对苏联自然科学哲学的兴趣也空前高涨,涌现出一批研究苏联自然科学哲学的专著,其中有代表性的是:希格弗利德(Miller Marrus Siegfried)的《爱因斯坦和苏联哲学》(1960年)、托马斯(B. Thomas)的《苏联的知识论》(1964年)、马克西姆(M. Maxim)的《相对论和苏联共产主义哲学》(1965年)、费阿本德(P. Feyerabend)的《辩证唯物主义和量子论》(1966年)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随着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兴起,出现了一股严厉批判自然辩证法的思潮,首先是法兰克福学派,随后是一批持不同哲学观点的西方学者。前者代表性著作有卢卡奇(G. Lukacs)《历史与阶级意识》(1923年)和马尔库塞(H. Marcuse)的《理性和革命》(1941年);后者有李希特海姆(G. Lichtheim)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和批判研究》(1961年)和约尔丹的《辩证唯物主义的进化:哲学和社会学分析》(1967年)。

但是,上述研究有一个根本问题,那就是研究者都怀有不同程度的偏见。一般说来,他们都把辩证唯物主义看作是官方禁锢自由思想的手段,看作是学者被迫接受的一种意识形态符咒。这种简单化的认识,一度成为西方研究苏联自然科学哲学的指导思想,从而严重限制了这一领域的学术进展。20世纪60年代中,一种新的思想导向开始形成。

20世纪60年代以后,西方对苏联自然科学哲学研究的思想出发点有了明显的变化。自从苏联在空间科学和其他尖端科学领域显示了巨大的实力后,西方改变了对苏联科学一味贬斥的态度,试图寻求苏联体制下科技进步之谜,其中包括对辩证唯物主义与科学关系的评价。所罗门(S. G. Solomon)指出,摆在当时西方苏联学家面前的问题是:“辩证唯物主义对苏联自然科学的指导有哪些不同?在20世纪60年代,科学史家是考察辩证唯物主义在俄国开始成为主宰时,苏联科学和哲学的关系,而在当前时期,当辩证唯物主义已经成为一代苏联科学家专业训练的一部分时”,它“对苏联科学工作又造成了什么影响?”^①新观点的代表人物是格雷厄姆(L. Graham),其名著《苏联的科学 with 哲学》出版于1972年,1987年又以《苏联自然科学、哲学和人的行为科学》为题出了新版,1991年该书被译成俄文在即将解体的苏联出版。这部著作代表了西方在这一研究领域的最高成就,显示了很高的科学性。在该书的俄文版序言中,他断言:“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和世界上许多学

^① L. Lubrano etc. (ed.), *The Social Context of Soviet Science*. Westview Press, 1980, P. 9.

者的观点十分接近。”^①他特别举出美国著名物理学家、诺贝尔奖得主格拉肖(S. Glashow)的一段话来证明他的论断。这段话是:“我们相信,世界是可知的,存在着简单的规则,而物质的发展和宇宙的进化过程则服从于这些规则。我们也断定,存在着某些永恒的、客观的、对社会中立的、独立于历史的普遍真理,而与这些真理相关的就是所说的物理科学。可以判明,自然规律具有普遍的和不变的性质,它们不受外在的围限,不能被破坏,也不能被改变……处在宇宙的任何地方的任何理性主体,在解释质子的结构和超新星产生的本质时,都不可避免地得出与我们相同的逻辑框架。我不能用什么事实来证明和证实这一论断。我只是相信这一点。”^②格雷厄姆认为这正是苏联自然科学昭示的基本理念。格拉肖的一番话,真是大哉言也,日月经天,江河行地,无论后现代文化如何喧嚣,这一点是不会改变的。格雷厄姆的这部著作,内容丰富,材料翔实,理论力求公正,是国际上公认的关于苏联自然科学哲学的权威著作。遗憾的是,作者仅限于讨论苏联学者在各门科学的哲学问题方面的工作,而对科学哲学领域(科学认识论、科学方法论和科学与社会的关系)的研究却付之阙如。在1991年出版的俄文版序言中,作者坦承:“如果我今天——1989年——来写这本书,那么我想对之重新审定的一个理由就是要考察‘本体论’和‘认识论’的关系。”^③事实上,这正是我们今天要着力去做的。

此外,值得一提的很有影响的著作是斯坎兰(J. P. Scanlan)的《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对当代苏联思想的一个批判性考察》(1965年)。但由于该书着眼于一般哲学问题,未专门触及自然科学哲学问题,这里就不再赘述了。

三、中国的研究

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学术界已经接触到苏联自然科学哲学,一些苏联学者的科学哲学著作被翻译过来,如1936年翻译出版的乌兰诺夫斯基的著作《新哲学与自然科学》等。20世纪50年代,新中国刚刚成立,在“全面学习苏联先进经验”的思想指导下,开始大量译介苏联著作。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难免良莠不分,特别是把那些极左路线的代表作当作马克思主义的典范作品介绍过来,如李森科(Т. Д. Лысенко)、勒柏辛斯卡娅(О. Б. Лепешинская)等的伪科学著作,粗暴批判摩尔根学派、哥本哈根学派、控制论、共振论、相对论的著作,都被当作正面的东西而得到广泛的传播。1956年,根据“双百方针”,青岛遗传学学术讨论会纠正了苏

① G. Graham, *Science, Philosophy and Human Behavior in the Soviet Union*. N. Y., 1987, PP. 429 ~ 430.

② Л. Р. Грэхэм, *Естествознание, философия и науки о человеческом поведении в Советском Союзе*. Политиздат. М., 1991. С. 5.

③ S. Glashow, *We Believe That the World is Knowledge*. The New York Times, October 22, 1989, P. 2.

联在遗传学领域的错误做法,使国内学术界开始以分析的态度科学地对待苏联自然科学哲学的研究成果。还在1959年,龚育之就已发表论文对苏联学者关于哲学与各门自然科学关系的观点提出异议,反对用哲学思辨取代自然科学的实证研究。但是,由于随即发生的中苏关系的重大变化,从60年代起,对苏联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纯学术讨论已经不再可能,因此,除了编辑一些内部资料——《苏联自然科学哲学领域思想动向的历史资料》(1925~1952)、《苏联自然科学哲学领域思想动向的历史资料》(1953~1963)、《全苏自然科学哲学问题会议文集》——之外,专门的研究实际上已经停止。

“文化大革命”以后,龚育之于1978年发表了《自然辩证法工作的一些历史情况和经验》的著名讲话,回顾了苏联自然科学哲学的历史演变并深刻总结了自然辩证法学科在苏联发展的历史教训。1980年,孙慕天在《苏联近年来自然科学哲学问题研究的一些情况》一文中,在国内首次介绍了60年代末到70年代这一段苏联自然科学哲学研究的动向。1984年,在龚育之的支持下,黑龙江省自然辩证法研究会于1984年和1987年先后召开了两届“全国苏联自然科学哲学学术研讨会”,这项研究全面恢复和发展起来。

80年代国内苏联自然科学哲学研究的主要成果,是推出了一批系统研究苏联自然科学哲学总体情况和历史演变的著述,如柳树滋的《苏联哲学与自然科学联盟三十年(1953~1983)》(1983年),孙慕天的《苏联自然科学哲学研究的历史和现状》(1987年)、《科学哲学在苏联的兴起》(1987年)和《自然辩证法六十年》(1989~1990年)。柳树滋和孙慕天还专门为《自然辩证法百科全书》撰写了《苏联自然辩证法研究》的条目(1995年)。同时,龚育之和孙慕天等还主编了《苏联自然科学哲学丛书》(1989~1990年),第一批书籍包括(编写和翻译)三部著作:龚育之、柳树滋主编的《历史的足迹》(1990年),孙慕天等翻译的《苏联自然科学哲学教程》(1989年)和《辩证世界观和现代自然科学方法论》(1990年)。一时间,研究、介绍和翻译苏联自然科学哲学研究成果和动向的著作与论文纷纷问世,涉及苏联自然哲学、科学哲学、技术哲学、各门学科中的哲学问题以及苏联学者对西方科学哲学的研究等主题。此外,研究苏联一般哲学问题的学者也开始关注苏联自然科学哲学领域的进展,贾泽林主编的《苏联当代哲学(1945~1982)》(1986年)和安启念的《苏联哲学70年》(1990年)等著作中,也都包含自然科学哲学的内容。同时,在这一时期,国内开始建立研究苏联自然科学哲学的专门机构,哈尔滨师范大学于1987年成立了远东科技与社会发展研究所,出版了《苏联自然科学哲学研究动态》,招收了硕士研究生。中苏学者之间的直接学术交流也频繁开展起来。1988年由国家派出数位访问学者和留学生到苏联专门研究自然科学哲学问题,与苏联学者开展了密切的合作,孙慕天与乌克兰学者采赫米斯特罗(И. З. Цехмистро)合著的《新整体论》(中文版出版于1997年)就是这些合作的成果之

一。总之,在 20 世纪 80 年代,我国对苏联自然科学哲学的研究一度出现了相当繁荣的局面。

但是,随着苏联的解体,由于种种原因,这项研究突然沉寂下来。许多拟议中的学术规划搁置起来,相互交流陷于中断,出版物停刊,著作不再出版,相关的研究论文也基本上消失不见。可以说,90 年代以来,国内对苏联和独联体国家自然科学哲学的研究进入了低谷时期。

四、研究苏联自然科学哲学的意义和目标

尽管苏联解体以后出现的诸多客观因素,给苏联自然科学哲学的研究带来了严重困难,但是,因此而放弃这一研究,则是极不正常的,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一种功利主义的短视。整整 70 年的社会主义实践和既有的丰硕成果,其间充满曲折失误的独特的理论探索,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一个巨大的存在,是不可能置之不顾的,是任何人无法抹杀的。在西方,苏联解体后以福山(F. Fukuyama)为代表的“历史的终结论”甚嚣尘上,任何对苏联的研究似乎仅仅是为了给社会主义唱挽歌,这当然是典型的西方式的意识形态偏见。对此,我们一定要保持清醒的头脑。

面对苏联解体的现实,我们回过头来研究苏联自然科学哲学的历史发展历程及其成就和经验教训,不能不带有总结苏联的社会主义历史的性质——即从一个学术领域的特殊侧面,回顾这个具有 70 年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国度的具有悲剧意味的思想历程。因此,这项工作的核心在于捕捉苏联自然科学哲学的发生、发展及其成就所蕴含的历史理念。

按照格雷厄姆的说法,研究苏联的科学有三重目的:“①更好地了解苏联;②更好地了解科学;③更好地了解工业化国家所面对的共同课题。”^①套用这一说法,研究苏联自然科学哲学的目的就是要:更好地了解苏联走过的历史道路及其历史教训,更好地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更好地了解科学与一般社会主义事业的关系。

从 20 世纪 30 年代起,就出现了对苏联自然科学哲学进行反思性评述的著作。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由于研究者的价值取向和视角,也由于苏联自然科学本身的演变和进展,前人的研究几乎都是从侧面切入,带有“单向度”的性质,而且往往是断代性的。虽然对某一部门、某项专题、某个人物的研究可以达到相当的深度,但对我们所提出的三重目标来说,则是远远不够的。为了实现我们所提出的目标,我们认为,今天对苏联自然科学哲学的综合研究必须做以下一些工作:

^① L. Graham, *Reasons for Studying Soviet Science*. L. Lubrano etc. (ed.), *The Social Context of soviet Science*. Westview Press, 1980, P. 2.

1. 正确规定苏联自然科学哲学的研究领域

按照苏联学者的解释,狭义的自然科学哲学属于自然观或自然哲学的范畴,限于对世界图景或传统本体论问题以及各门自然科学中的哲学问题的研究;而广义的自然科学哲学应当涵盖科学认识论和科学方法论(即科学哲学),科学的社会文化论,还有技术哲学。格雷厄姆以及我国学者贾泽林等人都采用狭义的界定,把科学哲学排除在自然科学哲学研究之外,这当然是不合适的。事实上,从20世纪60年代起,从总体上说,苏联自然科学哲学的研究已经发生了重心转移,科学哲学成了苏联自然科学哲学的核心领域^①。斯焦宾(В. С. Стёпин)在其给格雷厄姆的《苏联的科学、哲学和人的行为的科学》一书的俄文版所写的序言中指出:“六十至七十年代,在苏联哲学中对科学认识论、科学逻辑、科学方法论和科学史的交叉领域集中进行了研究。在科学知识的结构和动力学方面的丰富文献就是这些研究的成果。显然,这一时期所探讨的许多思想在西方还鲜为人知。”^②我们的研究特别突出了这一方面。

2. 追踪苏联自然科学哲学演变的历史线索

本书是一部目前国内外唯一的广义理解的苏联自然科学哲学综合研究成果。苏联自然科学哲学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其研究重心、问题结构、指导思想、争论焦点等,都曾数度变迁。追踪这一演化历史,是我们从广阔的社会背景上把握苏联自然科学哲学本质特点的前提。前人在这方面的研究基本属于“断代”的性质,迄今尚未形成一个明晰的历史分期概念。根据我们的研究,苏联自然科学哲学的历史演变有几个关节点:1928年,自由的学术探讨开始被严密的思想控制所代替;1956年,开始对学术领域的极左思潮进行清算;1965年,研究重心从本体论向认识论转换;1985年,对科学的文化价值论研究开始成为热点,放弃马克思主义立场的倾向主流化。这些关节点把苏联自然科学学的发展明显地分为四个时期:开辟时期,摸索时期,调整时期,转型时期。

3. 揭示苏联自然科学哲学发展的社会动力学机制

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苏联自然科学哲学的历史演变,是与苏联社会的结构性变迁及其社会矛盾的发展密切相关的。美国学者所罗门首次提出研究苏联科学的语境主义(“上下文主义”,cotextualism)原则,他与卢布拉诺(L. Lubrano)合编

① 孙慕天:科学哲学在苏联的兴起,《自然辩证法通讯》,1987年第1期。

② И. С. Стёпин, Анализ исторического развития философии науки. В кн. Л. Р. Грэхэм, Естественнания, Философии и науки о человеческом поведении в Советском Союзе. М., 1991. С. 435.

的一本书就题名为《苏联科学的社会上下文》(《The Social Context of Soviet Science》,1980)。但是,应当指出,他对苏联自然科学哲学发展的历史文化背景研究,有许多是十分肤浅的,甚至是庸俗的。例如,他一般将某些科学哲学观点的提出,简单地归之于苏联共产党的政治目标,甚至归之于某一政治领袖个人的政治意图,这种庸俗社会学的研究方法是西方哲学思潮的渗透和影响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这反映了苏联学术界对哲学性质和功能的新理解在学术界十分流行。苏联流亡者麦德维杰夫(R. Medvedev)的名著《苏联的科学》就有这种倾向,造成了广泛的影响。我们必须回到唯物史观,否则就无法解释20世纪60年代在苏联出现从本体论向认识论的研究重心转移的现象。在我们看来,这一转移是新技术革命兴起、对传统的理论教条主义进行反思和批判。哲学不应看做是证明的工具,而是世界观和认识方法。本书力求对苏联自然科学哲学做出合理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诠释。

对苏联自然科学哲学的价值的一种流行的看法认为,对苏联自然科学哲学的研究是一种无效劳动,它似乎除了作为官方禁锢科学自由思想的枷锁外,没有什么积极意义。奈格尔(E. Nagel)甚至说:“正像在一次政治集会末尾牧师所做的祈祷一样,对多数科学家来说,隆重宣扬的哲学同科学知识是风马牛不相及的。”这种说法当然不够客观。对于辩证唯物主义促进苏联科学的发展这一事实,格雷厄姆做了公正的说明。他认为,苏联自然科学哲学有双重效应。一是正面启发效应:“当科学家的研究触及到知识的极限,触及到那些推测必将起到极大作用的领域,那么,辩证唯物主义对于科学家来说就是很有价值的。”二是反面启发效应:“它绝不能预言具体的实验结果,但它却可以警告人们,面对深奥莫测的神秘事物和未知领域的恐惧,不要沦为神秘主义的牺牲品。”在我们看来,具体探求唯物辩证法对科学研究的启发价值具有重大的意义,事实上,自从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中系统做过这方面的案例分析以来,苏联自然科学哲学可能是进行这项工作最好的思想实验室。我们的研究表明,像福克(В. А. Фок)所提出的量子力学的“潜在的逻辑相关性”的本体论思想、布洛欣采夫(Д. И. Блохинцев)提出的量子力学的整体性概念——系综都对量子力学的发展产生过积极的影响,而这些原创性的观念都是直接根据辩证唯物主义的哲学范式建构起来的。在苏联自然科学哲学中这样的事例俯拾皆是,如施米特(О. Ю. Шмит)的引力宇宙学、阿姆巴米楚扬(В. А. Амбарцумян)的星体形成理论、纳安(Г. И. Наан)的“膺封闭”宇宙理论、奥巴林(А. И. Опарин)的生命起源理论等。

自然科学哲学是自然科学与一般哲学之间的中介,辩证的科学哲学是适应科学的发展,汲取科学的最新成就,丰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最重要的渠道。恩格斯说